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二期 ——  
(二〇〇四年六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6c)

---

【难忘岁月】参加 3 2 1 1 1 队血战火海事迹宣传演出记	李中石
【往事追忆】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	李中石
【史海钩沉】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中的较量	温 相
【史料存真】在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 座谈会上的讲话 (1 9 6 7 年 1 1 月 9 日和 1 2 日)	江 青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难忘岁月】

参加 3 2 1 1 1 队血战火海事迹宣传演出记

• 李中石 •

1 9 6 6 年 6 月 2 2 日凌晨 1 时许，位于四川省合江县的塘河一号天然气井，管线突然爆裂，引发冲天大火。在这口井作业的四川石油 3 2 1 1 1 钻井队全体员工，牺牲 6 人，受伤 2 1 人，历经 3 0 多分钟的生死搏斗，终于制服了井喷，扑灭了大火，保住了气井和气田。（见本刊 z k 0 1 0 1 a 何蜀：“文革中的 3 2 1 1 1 钻井队”——编者）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全国的 3 2 1 1 1 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的事迹，当时被媒体誉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凯歌，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伟大凯歌，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

我有幸从头到尾参加了歌颂 3 2 1 1 1 队血战火海事迹的舞台剧创作和到北京、大庆等地的演出。这在我人生旅程中留下了难忘的珍贵记忆。

◇ 人生难解之谜把我推上文艺舞台

我走上文艺舞台，纯属偶然。

1964年，我初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总平均为95.5分，升学考试总平均也超过90分，但因“家庭成份”不好而被打入另册，名落孙山，成为“社青”（“社会青年”，当时对失业青年的称呼）。虽在街道上组织的学习、劳动中拼命努力表现，但仍与招工无缘。

1965年夏，喜讯从天而降，四川石油管理局来渝招工，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无需政审，愿意的都可去，这对于我无异于天上掉下的馅饼，能够当上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作“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多么令人自豪。——后来才知道，我们只是被招去作挖土石方、修公路、平井场的民工（临时工），并非“光荣的石油工人”。而那场“死拚猛打”、“穷干硬上”的石油大会战，也被“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所中断，并未在四川找到“第二个大庆油田”……

怀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满腔豪情，8万多十六七岁的重庆青年（其中大多因“出身”、“成份”不好而无法升学或就业），离开家乡，投身于“四川石油大会战”的滚滚洪流之中。

我是于9月20日晚随队乘火车离开重庆的，次日清晨到资中，转乘大卡车到荣县、威远交界的荒山坡卡房店，分到机械化筑路处三大队六中队。所谓机械化筑路处，只是徒有其名，除了几台推土机、空压机外，说不上什么“机械化”，我们整天的工作就是用十字镐、锄头、钢钎、扁担、箩筐与泥土、石头作战，在荒山野岭中当“开路先锋”，为钻井作准备。

12月13日下午，我们七八个人刚把一块大石头推下悬崖，就听到大队宣传员叫我马上回住地，拿上行李到大队部，有专车接我到荣县处机关报到。我放下手中的钢钎，感到十分意外，调我到处机关干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伙伴们则七嘴八舌，有的说去学开汽车，有的说去学开推土机，还有人说去处机关培训后回来搞宣传……

伙伴们良好的祝愿，使我十分兴奋。我顺着林中的羊肠小道，飞快地跑回住地。住地在农民的牛圈房，下面养牛，爬上竹楼梯，上面搭成的阁楼，就是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的住处。收拾好行李，翻过一座山头，走了几里山路，来到位于公路边的大队部。大队长扬了扬手中的调令，对我说：“石头（他给我起的外号），马上到处文工队报到！车在门口等你。”

一听此言，我大吃一惊，从小长到17岁，我还从来没上过舞台，现在叫我去文工队，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再三向陈大队长解释，我对文艺一窍不通，是不是调令搞错了，我还是留在队上参加劳动吧。大队长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扔上卡车说：“这是处里的调令，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你的名字，错不错你都得去。”我转念一想，来山沟几个月，连荣县城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叫我去，我就去，权当是去县城玩一趟。

就这样，一辆苏制嘎斯51型卡车，拉着我一个人去几十公里远的荣县，在处宣传队报到后，先叫我到乐队，可是我什么乐器都不会，只得暂时把我分到演员分队。我从小争强好胜，干什么事都想干得最好。对陌生的文艺表演，我坚信，业精于勤，没有什么能难倒人的事。于是，天天早上，练声、压腿，一丝不苟，排练时虚心认真。加上人年青，反应灵，接收快。功夫不负有心人，春节前给荣县人代会演出时，我的表演，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好评，成为队中的主要演员之一。

直到一年多以后，处党委宣传科宋敬文问我：“你到底会不会拉二胡？”我说：“不会。”“那就怪了。当初调你来，是有人向党委何书记推荐，说三大队李中石二胡拉得非常好，得到过重庆市文艺汇演第二名。这样我们才把你调来的。”到底是谁，出于何种动机，跟我开了这样一个

玩笑，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这已经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难解之谜。可见，一次偶然机遇，有时会改变你的一生。

#### ◇ 扮演烈士浑身摔伤不畏难

当时，在四川开展找气找油的石油大会战，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三线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四川省威远县一个名叫新场的小乡场附近山坡上。新修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一排排用片石垒成的“干打垒”平房，错落有致，排列其间。山顶那幢当地最大的建筑——能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也是就地取材，用片石砌成的。这片地区被取名为红村。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966年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到这里视察时题写的“红村”两个红色大字，矗立在礼堂顶上，很远都能看见。

会战领导小组由曾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挂帅，小组成员包括石油部的几位司长以及四川石油管理局党政领导一班人。局机关大部分也都迁到这里，山顶上红村广播站定时广播的高音喇叭声，上山下山来往于各部门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车辆，使这片沉睡千年的荒山坡，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那时石油部门的文艺表演，受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队“对口词”、“群口词”、“枪杆诗”等表演形式的影响。追求一种刚劲有力、充满战斗气息的表演风格，把本部门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和生产成绩，编写成群口词或快板表演，同时配以铿锵的锣鼓节奏，加上夸张、粗犷的舞蹈动作、行进队列和静止造型，令人耳目一新。这成为当时石油部门独具特色的“文艺报捷”。各单位文艺队伍也叫文艺报捷队。演员都是从基层各部门抽调的，演出服装极为简单，男演员上穿蓝色夹克工装上衣，白色假领翻在外面，下穿蓝色劳保裤。女演员则身穿白衬衣，下穿蓝色劳保背带裤。手中的主要道具是两块系着大红绸蝴蝶结的竹板。为了表现石油工人的气概，一般在出场或需要强调的地方，拿竹板的右手都要高举过头，配合身体的动作，边打竹板边说。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井队演出，没有舞台，临时把两台载重10吨的“太托拉”卡车车厢板放下，并在一起作舞台。轮到我一个人高举竹板，走出队列表演时，一不小心，脚踩进两台车的连接处，一个趔趄，几乎往前跌倒，手中高举的竹板，如流星一般脱手，向下面的观众飞去。一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台上呆若木鸡，平时倒背如流的台词，一下子全忘到爪哇国去了。这时台下早有观众眼疾手快，接到竹板，扔回到台上，观众们还友好地笑着鼓掌鼓励我重来。这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演出失误。但也可见当时简陋的演出与淳朴热情的观众之间的“心连心”。

1966年6月底，全国各大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全面开展。红村也开始张贴大字报“声讨三家村”，“揪牛鬼蛇神”，许多大字报揭发批判了一个科室干部，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黑帮”（后来此人成为四川石油造反司令部的头头）。这使远离城市的我们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气息。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的机关报《会战通讯》报道了32111队血战火海的事迹。

7月9日上午，云集在红村，准备向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报捷的20多支文艺报捷队，突然接到通知，全部集中到红村山顶的大礼堂，听张副部长的报告。

会上，张文彬宣布：会战总指挥部决定成立总部报捷队，用文艺的形式，在舞台上宣传 3 2 1 1 1 队血战火海的英雄事迹。要求 7 月 1 5 日创作出初步方案，7 月 3 0 日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结束时汇报演出。在节目中一定要有《石油工人硬骨头》、《我为祖国献石油》、《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三首歌曲。要排演出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样气魄的节目来。

我在 1 9 6 6 年 7 月 1 0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向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报捷后，原以为我不会被选到总部宣传队，结果，宣布时，有我的名字，真是令人兴奋不已。……除乐队外，演员大部分都很年轻，刚出校门不久，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比较困难的，新成立的党、团支部，分小组组织了讨论，统一思想。各小组都写了决心书，大家一致表示，为演好英雄，宣扬毛泽东思想，就是累死在舞台上也心甘情愿，誓死完成宣演 3 2 1 1 1 英雄钻井队的任务。”

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报捷队（后改称宣传队）1 8 0 人，主要来自基建指挥部、筑路处、南充炼油厂以及川南、川中、川东北、川西北、石油沟等矿区的报捷队。演员中约三分之二是来自重庆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各小组表态的决心书，覆盖了声讨“黑帮”的大字报，醒目地挂满了驻地四周。群策群力、热火朝天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就此展开。谁的方案好，就照谁的办。经过两天的集思广益，舞蹈节目选中川南矿区的《进军》、《抬工号子》，筑路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打夯歌》，另外有基建指挥部的对口词，南充炼厂的群口词等。要求演出的三首歌中，除《大海航行靠舵手》外，其余两首均要重新编排。

在短短几天中，要由这样一群毫无创作经验而且是临时凑到一起的人员创作排演这样一台要求高的节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在那时的“革命气氛”中，我们这批年轻人根本不知什么叫困难，“学英雄，见行动”，一个个像拧足了发条的机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请看当时的作息时间安排：

早 6 点：起床  
6 点半：练功、练声  
7 点半：早餐  
8 点到 1 2 点：创作排练  
1 2 点：午餐  
下午 1 点半到 6 点：创作排练  
晚 6 点：晚餐  
晚 7 点到 1 1 点：创作排练  
晚 1 1 点：加餐

当天进度必须当天完成。一般都要搞到凌晨 2、3 点左右，最长时甚至到凌晨 4 点。第二天仍然照常进行，每天排练的时间都超过 1 5 小时。

宣传队住在红村服务大楼（即招待所的新名称）。十多个平方米一间房，4 张上下铺，住八个人。时值盛夏，酷暑难当，房间里开始连电风扇也没有，空调那更是天方夜谭。我们入驻约半个月后，房间才装上了电扇。

最要命的是没有排练场，偌大一个红村，除了山顶礼堂的舞台外，竟然找不到其他排练场地。舞台要留给乐队、灯光、舞台美术用，演员们只得到附近农家三合土挞谷场去排练。在血

战火海舞剧中“五烈士”是重场戏，分别由徐重俊饰罗华太，许某（名字已记不清）饰王祖民，我饰吴仲启，曾祥荣饰张永庆，刘正委饰王平。除刘正委外，其他四位都是重庆青年。令人不解的是，牺牲的是六烈士，而邓木全烈士却未专门设计舞蹈排演，只在最后烈士塑像造型时才出现。

扮演烈士，无上荣光，我们的胸中充满激情。表现烈士们与烈火搏斗，需要在三合土地上摸、爬、滚、打，由于没有基本功，每次排练，都是硬摔在地上，我的手、肘部、膝盖很快跌破了，到医务室包扎一下又来。7月盛夏，烈日当空，抬谷场上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汗水早就把背心和裤子浸透，我们几个干脆就脱掉背心，赤膊上阵。刚包扎的伤口，很快又跌破了，汗水合着血水往下流。扮演烈士的演员都不同程度地受伤。为了减轻摔伤的痛苦，我们找来干谷草铺在地上，但很快发现踩在上面太滑，换成草垫又绊脚，后来用招待所床上的棕垫铺在三合土上，手脚用护膝、护肘保护，情况才有所好转。晚上排练，抬谷场上没有电灯，就点着蜡烛干，每天排练下来，浑身泥土汗水，又没有地方洗澡，只好在一尺深的小河沟里擦擦身。

7月17日，《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第一稿终于完成。全剧分为“序幕”（由诗朗诵和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石油工人硬骨头》、《我为祖国献石油》组成）、“进军”（由多口词，快板、舞蹈、抬工号子、打夯歌组成）、“血战火海”（由音乐、舞蹈、画外音三部分组成）、“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关怀、英雄们战胜烧伤”（为8个人的配乐诗朗诵）四场。

经张文彬副部长及会战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完全没有反映出32111队的精神来，特别是“血战火海”一场，至少要半小时，整台节目不得少于两小时。

创作排演的第一稿以失败告终。

◇ 重点宣传的烈士原是“三类”人物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十几家新闻单位组成的采访组来到红村采访。我们十多个主要演员多次参加了记者与32111队英雄的座谈。

最初讨论时，采访组提出，要像宣传雷锋、王杰那样，32111队也应该有自己的豪言壮语，于是便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帮忙“总结”，最前提的是：“把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在行动上！”后来，又觉得不太响亮，改为“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讨论副班长张永庆烈士的报道问题时，有人提出，张永庆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划成了“三类”（当时各单位都奉命暗中给群众作政治“摸底排队”，排为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四类是打击对象，三类属于不可靠的问题人物），因此宣传张永庆时要慎重。意见反映到总指挥张文彬那里，他十分生气：“人都烧死了，还讲什么‘二类、三类’，这些好同志就应该大力宣扬！”根据他的指示，张永庆的所谓“三类”问题一笔勾销，宣传的份量大大加强，成为六烈士之首。张永庆遗留下来的日记，也被找来由宣传部门“重新整理”，摘抄成“红色日记”发表。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变化，也许张永庆的日记还会像雷锋、王杰的日记那样广泛传扬。

为了全面反映英雄集体，报道组还提出要增加一名家属代表和一名青年工人代表。于是，在原有矿区及基层党政领导、老工人等英雄组成的宣讲团中，增加了灭火时正在队上探亲的家属牟茂修和从农村来的学徒工徐光益。英雄们的讲演稿，一律由报道组的笔杆子们分头编写，

集体讨论定稿后，报领导审查通过，再将讲稿发给他们背。演讲时的表情、语气、动作则由我们宣传队的人作“导演”，我曾经多次参与这样的“指导”。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词的家属牟茂修和满口川南方言的徐光益，成为辅导的重点。通过反复练习，牟茂修变得落落大方，演讲生动。徐光益也大有进步，方言大为减少，宣讲时外地人基本都能听懂。而他那略显夸张，声泪俱下的丰富表情，在当时的气氛下，更赢得大家的称赞。

#### ◇ 演英雄的宣传队里如何“破四旧”

文革形势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因工作组明令撤销，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基层，暂停大鸣大放，只开展学习 3 2 1 1 1 队的正面教育，对我们的创作和演出，则提出了提高质量、抓紧进度的要求。

8 月初，我们改出了第二稿，仍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核心的“血战火海”一场，本来大家是受电台广播篮球比赛现场播音解说的启发，采取了演员在台上表演，乐队按情节需要配乐，加上画外音解说的形式，但三者一直未能协调配合，修改后问题也没有解决，创作排练陷入困境。

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宣传部对这个剧的排演十分关心，这时派来了四川省歌舞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成都市歌舞团、成都部队战旗歌舞团、话剧团等单位的专业编导人员。他们来到以后，先深入到附近井队，了解钻井工人的工作、生活。学习 3 2 1 1 1 队的有关报道，从钻井队各工种的劳动中提炼出独有的动作特征，上升为舞蹈语汇编入舞剧中。又多次观看我们的排演，与我们座谈讨论，研究方案（这一切都是如今那种住星级宾馆通过闲侃炮制节目的“腕”们不可想象的）。

随后，他们对全剧，特别是“血战火海”一场，进行了重新整理。首先抓音乐创作，演员的舞蹈、画外音解说，都按照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落实到每个小节、每个音符……

要让我们这些毫无基本功的业余演员，在短时间内完成舞剧的编排演出，表现出血战火海的英雄气概，无疑是极其困难的。他们从我们最差的基本功抓起，编出一套简便易行的方法，使我们的基本动作逐步规范，并结合演员的实际情况，提出编排方案，交队里讨论通过后，再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辅导。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练多久，他们就要指导多久，他们的汗水和我们流在一起。凌晨，我们去休息了，他们还得制定第二天的排练计划。

我的那段表现吴仲启烈士牺牲的独舞，是省歌舞团吕波老师负责指导的。她身材很好，基本功扎实，工作起来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但高强度的连续工作，使她几次病倒，脸色苍白，直冒冷汗。大家劝她回去休息，她从来不肯，吃点药，喝口水，照样和我一起，在三合土地上摔打。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她都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示范、指导，直到我掌握了为止。

尽管队里准备了大量的绿豆汤、清凉油、仁丹、十滴水这类防暑药品，尽量调整排练时间，但还是多次发生排练时中暑晕倒的情况。

8 月 2 8 日，全队作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只保留了 6 0 多人。经过一个多月的修改排练，9 月 1 2 日，《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记血战火海保住大气井的 3 2 1 1 1 英雄钻井队》全剧终于完稿并通过了审查。全剧分为五场：

第一场 向新气田进军：大合唱、舞蹈《进军》、舞蹈《劳动号子》、多口词、舞蹈《乘胜挺进》；

第二场 血战火海：舞剧；  
第三场 毛主席在我们身边：配乐诗朗诵；  
第四场 学习英雄钻井队：快板群、歌舞；  
第五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歌舞《石油工人硬骨头》、《我为祖国献石油》、《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剧本的内容方面，还大量加进了学习宣传“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内容。

在我们创作排练的同时，以收集到的救火现场实物、烈士遗物及照片、图片等为主的3211队英雄事迹展览也紧锣密鼓地同时进行着筹备，很多解说词都取自我们演出的剧本。

9月25日，会战总部政治部吴主任在我们全队大会上说：毛主席、党中央对宣传3211队十分重视，由陶铸同志（当时中央领导核心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分管国务院日常工作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负责3211队宣传办公室工作，下辖3211队英雄事迹宣讲团。由宣讲队（即3211队本身）、3211工人业余演出队以及3211事迹展览队组成。先到成都，然后乘飞机到北京，计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到全国石油系统巡回宣讲、演出、展览。

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一下子沸腾了，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除了看过天上的飞机，几乎没有人坐过飞机，而且还要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去，真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有的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写信给重庆的亲友报告“我已乘飞机去北京”……

这时，红卫兵“破四旧”狂潮已在各大城市掀起。因为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鼓动，“破四旧”之风也刮到了石油会战的山沟里。在我们演出队开展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女演员分队中，有一位来自川南矿区的演员，名叫徐湘。她高高的个子，明亮的眼睛，舞蹈动作刚健有力，是队里的主要演员之一，她那一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特别引人注目，但却不幸成为队里“破四旧”的对象，大家要她剪掉“资产阶级发型”。她实在舍不得剪掉秀发，只得含泪离队回了矿区。

#### ◇ 不知疲累辗转演出

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9月26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早晨6点30分，红村广播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全文广播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以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社论以极具时代特色的，被称为3211队豪言壮语的一段话开头：“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一提法，与我原来参加座谈时听到总结的提法相比，删去了“刻在骨头上”一句。

当天早上，我们从红村出发，乘汽车前往成都，路过仁寿借田时，驾驶员跑到借田旅馆，借来了当天的报纸。我们争相传阅通讯和社论。到成都后，我们不顾旅途疲劳，连夜到曹家巷三分公司礼堂，安装灯光、纱幕、准备第二天晚上在成都的首场内部演出。

27日上午，我们得知因红卫兵进驻石油部招待所，原准备我们国庆前和3211队一起乘飞机去北京的安排改变。3211队仍按原计划去北京作“毛主席的客人”住进中南海，我们则推迟到国庆后再乘火车进京。

当天晚上的内部演出，我们化完妆后，列队将32111队英雄张仲珉、冉树荣等十多人迎进来。虽然这天没有公开演出，而且原计划悄悄来悄悄走，只演这一场。但闻讯赶来的观众很多，包括文艺、新闻、军队、党政机关等40多个单位，成都市歌舞团就来了70多人。虽然这天晚上演出中失误不少，但观众的反映仍然很好。

演完后，张仲珉、冉树荣等十几个伤势有所好转的英雄和观众见面时，全场沸腾了，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久久在剧场回荡。他们的烧伤还未全好，身上披着薄薄的纱布衣服，旁人的手不能去扶他们，一扶，新长的皮就要破，他们的手也不能举起来。

会见结束后，我们赶紧把道具、灯光、幕布等装箱，准备回红村。第二天清晨，队里接到张副部长的电话，说四川省委杨超书记打来电话，因我们在成都内部演出反应很好，西南局、省委及军区的领导要看，希望我们能在成都公演。但由于拉道具的车早已出发，派小车去追也没追上，在成都的演出只好推迟。为此，会战指挥部决定成立演出二队，要我们尽快教出来，今后我们到全国巡回演出时，四川战区的演出任务，就由二队担任，另外还要搞一个轻骑队，到各井队演出。

9月29日晚，在成都军区礼堂为《成都部队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演出，成都部队司令员黄新亭、政委郭林祥和西南局、省市部分领导人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全队人员立即拆台装箱，凌晨1点，星夜兼程，赶回红村。这天，正好是中秋佳节，几天后我抽空在日记中补记了当时的感受：“明月高挂，坐在奔驰的汽车上，看窗外山青水秀，乘车赏月，可谓诗境。”处于高度亢奋中而不知疲累的心情可见一斑。

30日上午9点到达红村，顾不得吃饭、休息，大家一齐动手搬运、装台、装大幕、天幕，直到下午5点才吃饭，当晚7点半开始为到红村参加国庆庆典的各单位代表和报捷队演出，这时大家深深地体会到苦战恶战、连续转战的艰辛。

国庆节上午，我们得知，9月29日，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首长接见了32111队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和大庆铁人王进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赞扬32111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集体。30日晚，32111队出席了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向各国来宾热情介绍：“这是我们的救火英雄！”党中央对英雄的关怀和鼓励，使我们深感演出责任的重大。

国庆之夜在红村演出完第二场，我们又星夜兼程赶往成都。2日晚，在“东方红礼堂”（原锦江礼堂）首次为西南局、省市机关公演，反响极为热烈。“文化大革命”时对英雄的狂热崇拜，使我们的演出一直沉浸在掌声、欢呼声和鲜花之中。接下来每天一场，直到10月6日晚为前来四川访问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演出后才结束了在成都、红村的辗转演出。

在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日子里，流行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参加创作排练的人，无一例外，只讲贡献（当时还不时兴说“奉献”），不求索取。加班加点，连续作战，对我们是“家常便饭”；搬运道具，拆装舞台，对任何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累倒、昏倒、受伤，从没有人抱怨，也从没人提出过“加班费”或者“补助费”等物质方面的要求。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恐怕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 在文革的心脏北京不准看大字报



10月7日，我们到了北京，这时才真正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震撼，满街的大字报、宣传车激昂的呼喊声，使得我们不知所措。

我在1966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10月7日乘20次特别快车，由成都到达北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中心，祖国的首都，毛主席的身边，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从小我就向往北京。北京啊！北京。今天我终于来到这里，在这崭新的北京日记上写上了第一页。昨天晚上，在西直门车站下车，受到部里两位司长和32111队王指导员和周队长的热烈欢迎。到了石油干校，王指导员代表32111队全体同志，送给我们每人一个主席头像纪念章。今天早晨，大庆职工家属业余演出队来看了我们，并送了慰问信，非常热情。下午，吴主任给我们规定了纪律，不准随意上街，不准看大字报，不准与红卫兵接触，就是在北京有亲友的人也不准有任何联系。他解释说，北京现在学习32111队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如果知道英雄和来自‘英雄阵地的英雄战友演英雄’，那我们就走不掉，完不成中央32111宣讲办公室交给我们到全国巡回演出的光荣任务。”

后来才知道，规定纪律，实际上是不想让我们受到红卫兵“造反”精神的影响。

到京当天我们就与32111队人员汇合了。32111队的学徒工徐光益，年龄和我们差不多，我一碰到他，就赶紧好奇地打听：“你参加国庆招待会，国宴吃的啥子？”他用浓厚的泸州方言实话实说：“不晓得，脚杆‘接是’（一直）抖！”

国庆节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天安门上讲话的王有发告诉我们，在天安门上，周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就是四川那个打火队嘛！”王有发幸福的回忆，使我们激动不已。

从8日开始，我们在石油部俱乐部排练，舞台比红村的小。晚上我们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看了大庆家属演出的六场话剧——《大庆家属闹革命》，我在日记中记载的观感是：“演得很好。政治思想性特别强。”从剧场回来时，我们乘坐的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0日晚，我们又到东方红剧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大庆工人业余演出队演出的歌舞——《大庆人永跟毛泽东》。

11日晚，康世恩部长等石油部领导及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次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我们到天安门玩了半天，照了相，到文化宫走了一遍。里面的建筑大多关着，不能进去看。只好到王府井大街转了一圈。晚上，在红旗剧场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他们加演了宣传32111队的血战火海，这个节目不太成功，没有反映出石油工人的气概，只是一些京剧武打动作，根本不像血战火海在救火，没有工人阶级的感情。大庆演出队就比他们强多了。”

这一则日记中竟丝毫没有关于满街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大标语和大串连红卫兵的记载。可见我们当时确实忠实执行了规定的纪律。

13日传达的部首长意见，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自以为很成功的演出，首次听到了批评：节目太舞蹈化、专业化；没有把血战火海的残酷性表现出来。演员的化妆、服装应该“形象化、生活化、真实化、劳动化”；第三场诗朗诵要推倒重来；要把病床搬上舞台，把伤员的伤势表现出来，把伤员们与烧伤作斗争的场面真实地反映出来……部党委决定委托大庆工委对我们的修改进行全面审查。

## ◇ 风雪严寒大庆行

大庆是我们十分向往的“铁人”王进喜生活工作的地方。列车驶过辽阔的松嫩平原，于10月16日凌晨3点到达大庆车站。后来我们得知，是因为首都来的一批红卫兵在哈尔滨火车站组织了几千当地红卫兵，准备拦截我们回北京宣讲。我们乘坐的火车不得不绕道，因而晚点。

我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到达时的盛况：“列车徐徐进站，我们受到在严寒中等候多时的大庆工委领导、劳模及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站台上毛主席画像、语录牌、语录本、红旗、鲜花汇成红色的欢乐海洋。32111队英雄下车时，欢迎的人们沸腾了。大庆以王铁人为首的十大标兵，上前为英雄们披红戴花。热情的大庆人把英雄们抬了起来。王铁人等标兵和我们一一握手，少先队员给我们献花，我们和英雄一起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大庆人高呼：‘向32111队英雄学习！向32111队英雄致敬！’我们则高呼：‘向大庆人学习！向大庆人致敬！’”

次日下午，在采油一部礼堂，大庆工委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向32111队人员赠送了毛主席纪念章、大庆五好标兵纪念章和大庆会战纪念章，也送给演出队、展览队每人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和大庆会战纪念章。

在大庆的日程安排为上午参观学习，下午晚上修改排练。修改前分小组讨论，讨论结果集中交给创作组。负责编写的人写好，再交给担任角色的演员熟悉，由执行导演排练，没有上场的其他演员在台下看，提出意见再修改。几上几下，最后将方案报大庆工委审查。这次改动最大的是，将原来反映党中央关怀英雄治疗烧伤的第三场配乐诗朗诵全部不要，改为话剧《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把病床搬到舞台上，通过化妆把残酷的烧伤状况和英雄们与烧伤搏斗的场面直观（近乎自然主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大庆，我们住在沙尔图农垦总场（当时大庆为保密的对外名称）东风接待站，尽管千方百计保密，仍有红卫兵找来。10月27日，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下这么大的雪，大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不一会，整个大地白茫茫一遍。下午排练完，我们回招待所吃饭，在门口碰到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衣服上还散落着雪花，脸冻得红红的，手放在嘴边，一边哈气，一边跺脚。看到我们，他们就一拥而上，拿出语录本要我们签字，其情景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找明星签字。我们再三解释，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演出队的，但他们依然不听，说他们冒着风雪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们：“你们不是英雄，也是英雄的战友！”我们实在无法推托，只能按宣讲团的规定，在他们的语录本上写上：“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落款一律写“32111钻井队”。这也是我一生中冒英雄之名给别人签的一次字。

后来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宣讲团干脆铅印了一批名片大小的语录卡，印上那几句早为全国人民熟知的豪言壮语，落款是“32111钻井队全体革命职工赠”。碰到红卫兵来就送语录卡。但不准收他们散发的任何宣传品，从而避免与红卫兵的进一步接触。这也使当时在全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经过半个月的反复修改，11月2日通过大庆工委的审查，全剧第四次重大修改终于定稿。从11月3日开始，我们在大庆采油一部礼堂正式公演。这是我们首次与大庆观众见面。当大幕徐徐拉开，雄壮的大合唱中天幕上打出“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时，全场掌声雷动。第一幕中的抬工号子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我们冒着室外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赤膊穿背心出场，反映32111队人拉肩扛运设备的场面。观众们被这种劳动场面所感染，有节奏

地随着号子的音乐鼓掌。舞剧“血战火海”在服装、道具、化妆上下的功夫，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为表现被烈火焚烧的景象，服装是接近生活真实的焦黑褐色“褴褛”破布片。当演到烈士们烧伤的身影、前赴后继奋勇前冲，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时候，我在台上清楚地听到观众们抑止不住的哭泣声。舞剧结尾处增加了灭火结束时全队集合的悲壮场面：当伤痕累累的灭火英雄相互搀扶，六位烈士烧得遍体鳞伤的塑像重新出现时，场内哭声一片，痛哭声中有人高呼“向3 2 1 1 1队英雄学习！向3 2 1 1 1队英雄致敬！”口号声一直持续到第三幕话剧开始。

话剧把英雄们累累伤痕以及顽强地与烧伤搏斗的场面形象、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全场寂静无声，观众的心似乎和台上伤员的心连在一起。痛苦时他们落泪，战胜烧伤后，他们欢呼雀跃。节目尾声《石油工人硬骨头》等三个歌舞一出场，观众又兴奋地随着乐曲的节奏鼓掌。《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台上台下的全场大合唱，气氛之热烈，是我们演出以来从未有过的。演出结束后，观众仍然久久不肯离去。

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后台卸妆，一个20来岁的女红卫兵找到我们。自我介绍说，她是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国庆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王有发谈过话。看了我们的演出，她很受感动：“希望你们到北京演出，向首都人民和毛主席汇报！”她同时表示，所有的演出事务全部由她负责。我们请她去找我们的负责人谈。后来听说，这位红卫兵，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头头谭厚兰。

在特定的时代气氛中，会出现一些今人难以想象的人和事。我在日记中发现了我已淡忘的一则记载：

“大庆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对英雄的敬仰，使他们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观看我们的演出。接待站50多岁的老工人刘正业同志，是其中的典型。当我们刚来接待站时，他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问寒问暖。4日晚上，他来看了我们的演出，第二幕血战火海，他就大哭了四次，手巾被泪水打湿了，就用帽子擦。回来已是12点。这天本不该他值班，但他不放心，到各处去检查了一遍。回到宿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爬起来连夜写了决心书，到凌晨3点多钟，他含着热泪在我们队领导面前，读了他的决心书，激动地说了他的心里话：‘我在旧社会，从小死了爹妈，一直给资本家干活，从来没有哭过，我不喜欢流泪，流泪有什么用？！解放后看过很多戏，从来没哭过。可在今天看了你们的演出，我接连大哭了四次，你们演得太好了，把英雄都演出来了。看演出如果没有哭的人，那他就没有阶级感情，对毛泽东思想不热爱。我在接待站工作几年了，接待过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和上海来的音乐家、歌唱家，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工人业余演出队，你们没有他们吃得好，但是你们比他们演得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好，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演出队，表现了石油工人硬骨头精神，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没有学好英雄就演不出这样的节目。只有工人业余演出队才能演出来。那些大城市的艺术权威，根本演不出。’他在决心书上说，向英雄学习，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并表示，这个月不休息，不回家。本来第二天该他休息，领导再三要他回家去看看，但他决不去。凌晨四点多钟，他找队领导谈话后，还是睡不着。一大早就冒着严寒跑了三个中药铺，买通大海（中药名）给我们治嗓子，到处都没有。他只好到百货商店买了一个《东方红》日记本，并且把几年前人民画报记者赠送给他的《人民画报》——大庆油田专刊（他保存得很好）赠送给我们队。把王有发送给他的主席头像纪念章，赠送给扮演王有发的同志，他送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本日记，一本画报，一枚像章，他送的是一颗赤诚的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工人的心。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11月16日早晨，队领导突然宣布：“马上准备回四川！”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吃惊，领导还宣布：“全队回原单位搞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重新集中，到全国巡回演出。”

对于文革形势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毫无所知，也满以为明春真的可以重新集中再到全国演出。不料这一计划已完全成了泡影。

这一诞生于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演出就这样无疾而终了。这时，由数亿人参加演出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剧却刚刚进入高潮……

□ 原载《红岩春秋》2000年六期

~~~~~

## 【往事追忆】

### 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

• 李中石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文艺舞台百花凋零，只有《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独霸舞台。以这些样板戏为题材摄制的舞台艺术片，成为充斥中国大陆银幕的绝对主角，在全国城乡反复上映，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还曾产生过一部经江青亲自批准，动用当时十分珍贵的进口彩色电影胶片摄制的舞台艺术片，它就是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即峨嵋电影制片厂，文革中改名）摄制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

这部影片在1969年国庆节前就已摄制完成（按计划是要向国庆节“献礼”），但却一直未能与观众见面，这是为什么？

笔者当年曾经参加过这部影片的创作和演出，现根据保存完好的剧本初稿以及多次修改稿、有关“首长讲话”记录、当时的日记等资料，将那段历史批露于后。

### ◇ 庆祝活动因“镇反”而夭折

那部影片的摄制背景是：1958年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的3月27日下午，到四川省隆昌县圣灯山（“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圣”字有封建色彩，改“圣灯山”为“胜灯山”），视察了四川石油管理局隆昌气矿炭黑厂。以后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这次视察便成了四川石油部门每年必须隆重庆祝的盛大节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更被捧上了“四个伟大”的神坛，他当年视察炭黑厂一事，便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拼命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好题材。

1967年“一月夺权”后，四川石油系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控制了四川石油系统的大权，从夺权以后就开始筹备将于当年3月27日举行的毛泽东视察胜灯山九周年庆祝活动。

2月10日，我在参加石油32111钻井队文艺宣传队，随钻井队英雄一起到北京、大庆巡回演出后，刚回原工作单位石油机械化筑路处上班，就接到“川油司”的调令。称“原32111队工人业余演出队重新集合，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推动战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于是，我和叶传禄、张纪明、赵汉华、徐莲英等人，来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所在地——威远红村。到“川油司”报到，参加筹备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九周年的庆祝文艺演

出活动。当时四川石油系统派系林立，不要说南充、泸州的不同派别不听“川油司”的“调令”，就连同一派的很多单位，也不服“川油司”管。忙了半个多月，只调来十来个人，离演出要四五十个人的要求相距甚远，无法正常创作、排练。

3月4日上午，“川油司”的工作人员忽然通知我们说，筹备活动改由隆昌气矿“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负责，叫我们立即离开红村，前往隆昌。我们感到十分奇怪，不是一直由“司令部”在筹备吗，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平时每天都碰到的“川油司”头头们也看不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凌晨，红村开始戒严“镇反”，“川油司”的主要头头都已被当作“反革命”抓捕，这一筹备活动只得交给隆昌气矿。

哪知到了隆昌气矿，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同样被抓，我们十来个人住在隆昌县粮食局的一个大粮站仓库里，根本无人过问。我们那时都年轻单纯，很有“革命自觉性”，几个人商量，自己开始创作以《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为主题的系列文艺节目。这也是第一次把《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作为文艺节目命名。

“镇反”高潮中谁还有心思搞庆祝活动？3月21日，隆昌气矿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筹备活动结束。隆昌气矿政治处给我们各自单位出具证明，证明我们“前来我矿参加庆祝筹备活动。现筹备活动结束，按财务制度在你处报销差旅费，并感谢你单位的大力支持。”实际上，由于当时“二、三月镇反”已全面展开，所谓“筹备活动”根本无法进行，第一次《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的文艺创作活动，就此夭折。

#### ◇ 首次演出引起轰动

1967年5月以后，随着“二、三月镇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川油司”得到平反，重新恢复发展，原32111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从北京告状归来后，继续担任“川油司”负责人。我们这一批原32111队宣传队的人员，又重新参加了“川油司”宣传队组建工作，在省内各地抽调了一批人员，配备了专门的大客车，到四川各地巡回演出。

1968年3月27日，是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胜灯山炭黑厂十周年纪念日。由于四川各地武斗不断，隆昌县城成为两大派武装争夺的要地；同时，四川石油系统内的造反派也忙于争权夺利，庆祝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这时，为庆祝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委会，“川油司”宣传队排演了一台歌舞节目（分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向毛主席表忠心”三幕）到四川各地演出。

有一次，我们到川南合江县演出。当时那一带正被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硝烟笼罩。我们被当作贵宾接待，住进合江县委招待所。我们住三楼，四楼以上却不能上去，原来上面是所谓“武装支泸”的合江指挥部。我们多次见到穿着军装、戴着大草帽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在这里进出。

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任主任，司令员梁兴初、副政委刘结挺、省革筹政工组负责人张西挺等任副主任，副主任中还有包括“川油司”彭家治在内的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我们宣传队也到成都参加了庆祝演出活动。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我们在组建宣传队的过程中得知，济南部队有一名战士作曲家张振邦，二胡拉得非常好，他作曲的《战士爱读老三篇》风靡全国，也使他成为文革期间为数不多，能在唱片上署名的人。听说他刚刚转业到四川石油系统，我们赶紧八方寻找，把他调到宣传队。小伙子个头不高，浓眉大眼，十分精神。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向他请教作曲的经验。他连连摆手说：“我哪里是什么作曲家！”他解释说，是《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的同志到他们部队组稿，他只写了几句，大部份都是编辑老师写的，不知怎么发表时署名就成为“战士张振邦”，使他成了“名人”。实际上他作曲知识有限，很难独立完成歌曲创作，同时他的二胡也拉得比较一般，使我们大失所望，没过多久他就离开宣传队了。

另一件事是：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向“工人阶级”赠送的“芒果”运到成都，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和我们一起上街游行跳“忠字舞”。

那天，成都街头万人空巷，红旗飘飘、毛主席语录牌、葵花向阳的“忠”字牌随处可见，到处是一片片红色的海洋。我们接到通知，到成都军区北较场集合，参加庆祝游行。我们换上新工装，戴上石油工人特有的银光闪闪的铝盔，手持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集合排队。按照惯例，队伍的最前面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然后是标语牌、红旗方队、由于我们是工人组成的舞蹈队、铜管乐队，就成为走在最前面的队伍，后面才是解放军部队。我们正要出发，忽然看见梁司令员一行走过来，走到红旗方队和我们舞蹈队之间，我在第一派，正好在他们的后面。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响起，我们跳起“忠字舞”。梁司令员一行也手持语录本，随着乐曲的节奏上下挥舞，跳起了“忠字舞”。老将军跳“忠字舞”的姿势自然有些生硬笨拙，但我们谁也不敢笑。

我们当时住在成都无机校，那里有省革委的一个什么部门。有一次，南充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来这里提抗议，由于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与那一派观点相敌对的，警卫人员不让他们进大门，把铁栅门上了锁。他们就在门外静坐示威。我看到铁栅门外有过去曾在32111演出队的同事，就走过去和他们寒暄了几句，还用大口盅给他们送去一盅茶水。没有想到竟在宣传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我“立场不坚定”；甚至有人说我是“叛徒”；差点被开除出宣传队。由此可见，当年派性对立到了什么地步。

#### ◇ “工宣队”进驻工人宣传队

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震天响，我们作为工人业余宣传队，也因被要求要占领“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而得到加强。人员扩大到60人左右，为庆祝国庆19周年和石油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重新创作了一台文艺节目，取名为《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分为“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石油工人献忠心”、“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三幕。全部由我们宣传队人员作词、作曲、排练、演出。特别是第三幕，在表现毛主席到炭黑厂视察时，我们想起电影记录片中，看到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泪流满面，挥舞《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的狂热情景。于是，我们在歌舞《太阳金灿灿》接诗朗诵表演《红太阳来到咱车间》中，插入了这样一段：

随着一声欢呼：“毛主席来了！”舞台上的演员拿着《毛主席语录》，一下子拥到舞台的右侧，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这时，《东方红》乐曲在欢呼声中响起，仿佛毛泽东正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激情的呼喊中，从舞台的一侧，一直喊到舞台的另一侧，大约持续四五分钟。尽管当年毛泽东视察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欢呼场面，而且当年更没有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的需要，可以打破一切框框，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排练时效果出奇的好，台上的演员和台下观看排练的人，全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又把第二幕改为《欢呼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用诗朗诵、表演唱、舞蹈、群口词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扩大并且充实了节目内容。其中，表演唱《小喇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它是由“文革”前一首农村题材的歌曲《小算盘》，经过宣传队集体改编而成。随着轻快、活泼、跳跃的乐曲，六个扎着小辫子的女演员，每人手拿一个小喇叭，一边唱，一边表演。唱词中包括我们到演出地后，临时采访编写的好人好事。由于内容贴近观众，形式新颖，表演生动，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也给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激烈火药味的所谓“文艺演出”，吹来一股新风。

10月28日，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在红村成立，原军管会主任赵永清任局革委会主任，“川油司”的彭家治等人任副主任。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代表省革委、成都军区到红村祝贺，张西挺也一同来了。当晚，在红村山顶的大礼堂，我们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首次公演。参加庆祝会的省革委、成都军区的负责人和局革委的所有成员以及一千多群众观看了演出。当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到毛主席视察一场时，台下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合着我们呼喊的节奏，使劲地鼓掌，台上、台下一片沸腾。观众的激情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们的情绪，“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不少的观众也泪流满面，有的观众还不时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演出结束时，观众站起来热情鼓掌，久久不愿离去。刘结挺、张西挺和局革委的负责人走上舞台，祝贺我们演出成功。刘结挺在接见我们时说，你们的演出十分感人，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你们都是工人，工人阶级要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他强调说，你们演出的节目要拍成电影，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样，让广大群众受教育。

从这时起，我们的演出就进入了准备拍摄电影的新阶段。

局革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队的领导工作”，按照省革委宣传组的指示，专门从隆昌气矿“三·二七”炭黑车间（曾被毛泽东视察的车间）调来两名工人，作为“工人宣传队”参与我们工人业余宣传队的领导工作。这件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本来就是工人，而且就是“工人宣传队”，本身就有“占领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还要其他的“工人宣传队”来领导、来“占领”我们这个地方？这两个人既不懂作词作曲，又不会唱歌跳舞，每天除了开会就无所事事，只好去钓鱼玩……大家始终没有理解“工宣队”进驻工人业余宣传队，究竟有什么“伟大意义”？

#### ◇ 李劫夫传达江青指示

随后，我们按照省革委的安排，到成都的四川剧场为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共产党员代表大会演出。此后又为省、市机关的造反派、解放军战士、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等演出。

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提前到四川剧场，并且不准带亲友来看演出。我们赶到那里，发现剧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演出开始前才通知我们，晚上有中央首长来看演出。直到演出结束，张西挺才陪同两位穿绿军装的人走上舞台接见我们。原来，这两位就是“中央首长”，经张西挺介绍，我们才知道，年纪较大、胖胖的老头，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李劫夫；戴眼镜、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

作曲家李劫夫的大名，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他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毛主席语录歌》等，我们都十分熟悉，因此，对他十分崇敬。等到他一开口作指示，更叫我们大吃一惊。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演出十分成功，我非常激动！”他停顿了一下，提高声调说：“我代表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听到这句话，我们顿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我们这样一支普通的工人业余宣传队，能够得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重视，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李劫夫告诉我们，江青得知石油工人

自己创作、演出的歌舞要拍成电影，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他还说，江青同志还亲自批示，专门拨给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两小时的进口彩色胶片，作为拍摄这部影片时使用。

李劫夫、刘春华的到来，以及他们传达的江青指示精神，无疑为这部影片的摄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一边演出，一边筹备创作。由于刘结挺当时的指示并不明确，我们的创作提出三种方案：

一、拍摄记录片，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基层为生产第一线进行文艺演出的情况；

二、拍摄记录片，反映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创作、演出的情况；

三、拍摄舞台记录片，用歌舞形式反映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的情况。

经过宣传队创作组的反复研究，大家认为，以我们目前演出的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为基础，重新创作一批新节目对这一幕进行充实、扩展。使《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成为一台单独的歌舞节目，才能拍摄成舞台记录片。这一方案报告给省革委，很快得到批准。宣传队全体成员一齐动员，群策群力，作词、作曲的分头行动。不管是词或曲，写出来以后都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意见再进行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直至大家认为比较满意为止。像石油沟气矿的舒云才作曲的《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经过多次修改，以优美抒情的旋律、浓郁的四川民歌风味，给当时充斥“火药味”的舞台吹来一股新风。但是，在当时形势下，有人提出这首曲子“软绵绵的”，有“小资产阶级情绪”，还反映到了张西挺那里，以至于1968年5月31日晚，省革委、成都军区领导审查演出后，张西挺还提出所谓的“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看看有没有摇摆舞，情歌小调。”的问题。由于这首曲子赢得大家交口称赞，最终得以保留，成为后来摄制影片的主要插曲之一。

#### ◇ 刘结挺要求突出路线斗争

为了加强创作力量，11月初，省革委派来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副主任、导演李家模参加创作，并担任本片的导演；当时四川著名的笔杆子，解放军空军028部队的邓绪东也调到创作组参加创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三易其稿，将全剧分为“手捧炭黑上北京”、“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红心红火向着红太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石油工人永远忠于毛主席”五场。第三稿的序幕，设计为当时最隆重的“献忠心大会”。从以下文字记叙可见当时的时代气氛之一斑：

幕前曲，欢快，热烈。幕起：红旗飘舞，锣鼓齐鸣，欢声雷动，群情沸腾。石油工人的““献忠心大会”正在热烈进行。

天幕为“献忠大会”主席台，远处是炭黑车间背景。主席台正中挂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金光闪闪的画像，下面九朵葵花簇拥着三个‘忠’字，耀眼夺目。两侧的毛主席语录牌上，用鲜红的大字，写着最高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8年12月30日，李家模将第三稿送交刘结挺审阅。1969年元旦上午，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主任赵永清等向刘结挺汇报工作时，刘结挺谈到《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剧



本，说：“《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这个剧本，你们要抓紧，要很快搞出来。剧本初稿看了一下，感到有两个问题，要修改一下。剧本中两条路线斗争未突出，有点就视察论视察。我们要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才能教育群众。要通过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体现石油工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通过批判刘少奇，联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石油工人对毛主席的热爱提高到崭新的境界。剧本里面有个别词句还有学生腔，要用工人的语言。”

根据刘结挺的指示，创作组重点加强了第四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突出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加大了“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分量，于1969年1月24日完成了第四稿。这一稿的序幕作了较大修改，将原来的“献忠大会”改为以男声独唱《毛主席来到胜灯山》为主的一组歌舞。歌词自然充斥着“毛主席来到胜灯山，红太阳从我们心中升起”之类时代语言。布景中的“三·二七车间”，除去有毛泽东画像外，还有大幅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必不可少的“毛主席语录”：“革命委员会好”“四川很有希望”等。布景中还特地设置了一瓶炭黑，瓶上写着一个鲜红的大“忠”字，“忠”字上是呈弧形排列的小红字：“敬印毛主席著作的特级炭黑”——这当然只有拍特写镜头才能看清楚了。

序幕后，分为“我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红心红火向着红太阳”、“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石油工人永远忠于毛主席”等共五场。

1969年4月27日，摄制组完成了分镜头，再次对序幕作了较大的修改，更加突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狂热迷信的时代气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主办的《文艺革命》杂志为庆祝中共“九大”出版的第4期，公开发表了作者署名“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人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歌舞剧〈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选刊》。这首歌最后唱道：“站厂房，看五洲，千斤担，挑肩头。要实现世界一片红，毛主席的光辉照全球，照全球！”

在影片筹备拍摄期间，四川音乐学院、原峨嵋电影制片厂乐团，省、市歌舞团，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等专业文艺团体，派出了词、曲、编、导、演、乐队、舞美等各方面的精兵强将协助宣传队的创作、排练，同时参加影片的配音等工作。

为了保证摄制队伍的“纯洁”，在此前后，宣传队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由于队员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青人，决定了这样的“清理”，只能是对他们的父辈、祖父辈进行清查。深受欢迎的《小喇叭》的主要编导、也是队里的主要女演员之一，由于外祖父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首先被清洗；担任剧中女工的演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由于剧中女工在影片中有特写镜头，也被替换，由隆昌气矿一个出身有三代工人血统的检验工取代。但是，由于她不会说普通话，摄制组不得不找专业演员给她配音。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我和其他一些人，也陆续被清理出队，未能参加完全部摄制工作。

#### ◇ 省革委集体审查演出

正式拍摄前，1969年5月31日晚11时30分至6月1日凌晨零点27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负责人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谢家祥、张西挺、胡继成、郑志士、段思英以及省革委副主任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冯玉德、彭家治、江海云、蔡文彬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省革委在成都的常委共数十人，在成都东方红大礼堂（原锦江礼堂）观看了演出。

在演出结束时，宣传队请首长作指示，梁兴初说：“好，好！”李大章说：“不好拍，不好拍。”

谢家祥说：“我不了解历史背景。看了以后请大家说。”

随后，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谢家祥、张西挺等于凌晨零点35分到3点接见了全体工人演员和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摄制组的人员，对拍摄影片的有关问题作了指示。

根据当时的记录看，张国华讲得多些。他说：“政治内容没有听到问题，很好。……表演不错，下的功夫很大，造反精神很强，干劲十足，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勇敢、革命性和创造精神。我受了感染。主题思想是什么？不大集中。从毛主席视察到文化革命，到炭黑试验成功，到工人代表上北京，这当中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出来了，问题是不大集中。毛主席视察对大家是鼓舞，但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去了以后，就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带到那里去了，告诉工人怎么办，怎么作，指引工人沿着正确路线前进。”“演是可以演，但拍电影的话，还要修改。主题上，还要修改。形式是好形式，简便，大众化。怎么在技巧上加点工，再提高一下。使人看出每场有段落。……我们今天看都是高潮，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高潮，看不出起伏。我看技巧上还要提高，排练、导演上，艺术服从政治。要我讲能讲，要我写不行，要我演也演不出来了。”“总的说，还不错，再加一点工，应该用集体智慧，工人阶级嘛，炭黑都能创造出来，要有一个什么为中心。别的我说不出来……”他再三强调“拍电影还是要改改”，“我们拍一部电影，要慎重，要从各个角度都站得住。政治上、艺术上都站得住。”

当张国华问起“你们（演出中）那个旗帜‘三·二七车间造反团’……”时，彭家治插话说：“要改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张国华问：“你们三·二七车间几派呀？要注意九大的方向，九大的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是主席提的嘛。旗子出来要注意这个问题。”

刘结挺在讲话中说：“第一次我是在红村看的。现在看，后面两场好像是安上去的，像栽稻子一样。一看就是两半截。”张西挺说：“我从北京回来后，听说他们要拍，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看看有没有摇摆舞、情歌小调。（按：当时江青无端指责北京电视台庆祝“九大”的一组歌舞节目中有摇摆舞、情歌小调，下令全国文艺单位严查。）因此叫不忙拍，等审查后再说。”我们宣传队领导说：“请首长审查有没有摇摆舞。”张西挺说：“可以，没有庸俗化。”张国华也说：“现在看没有摇摆舞。摇摆舞是指低级庸俗的……后边有秧歌。”

导演李家模在首长们讲话中插话问：“是否可以一边拍前三场，一边修改四、五场？”张国华说：“这是你们的业务，你们去处理嘛，就是光拍前三场也得改一改。对主席的视察，表现时夸张是可以的。但还要注意真实性，完全虚构不行。今后拍了电影，主席、江青同志要看的。不然主席看了以后说，我不是这样的。”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

在中共“九大”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张西挺，还是学着江青的样子给演出挑了个毛病：“工人昏倒了出来，有个女声唱的那段有问题。（按：指歌曲《双手捧起毛主席的像》）我不是泼冷水，我看就拍前三场，后面不拍。要拍，几个月拍不出来。另外，我想同志们都是工人，长期脱离生产不好。你们贪大求全，搞成歌剧了。”张国华转圜说：“歌剧也可以，要交代清楚。”

李家模说：“我们拍好前三场，请首长审查。”张西挺说：“拍好了，再审查，还行呀？”张国华又转圜说：“拍了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嘛！”

李家模又说到：“下去后，感到三·二七车间那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事迹很动人，我们水平低，没有写好。”刘结挺说：“你们组织个创作班子，下去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写个好剧本。”张西挺强调：“写好以后，送给中央文革审查，然后开拍。”刘结挺提出：“‘十一’以前拍出来就行。”

这次审查演出，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外，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等其他领导人，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观看《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

这次接见后，按照张国华等人的新的指示精神，再次对全剧作了重大修改，砍掉了四、五场，只保留了序幕及前三场：“毛主席来到胜灯山”、“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来到咱车间”。

1969年7月21日，报经中央审查通过的电影文学剧本《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终于定稿，正式拍摄的剧本序幕又作了一些修改，比如这一段朗诵就很有时代特色：

“毛主席啊红太阳！我们石油工人遵循您老人家的伟大教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了帝、修、反的封锁。生产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油墨炭黑，印制出亿万卷毛主席著作，送到各国革命人民手上。毛泽东思想传过五洲四海，红太阳的光辉把世界革命的道路照亮！”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专程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驻地红村附近的威远县越溪区山区工地拍摄了外景。当年在石油机械化筑路处四大队工作的张旭明回忆，摄制组到工地后，组织了十几个民工，找来一个锈迹斑斑的旧油桶，漆上“USA 美孚石油”的字样，埋在工地。拍摄时，几台推土机排成一行，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弃土向着镜头推来。突然，推出了这个预先埋好的旧油桶，这时镜头推进，出特写镜头，让观众看清是“USA 美孚石油”；接着民工们一拥而上，砸烂这个“美国油桶”；推土机冒着黑烟，履带从砸烂油桶的“USA 美孚石油”字样上碾过……

#### ◇ 尾声

影片摄制完成后，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刘、张被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学习。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12月25日中央对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个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一二·二五批示”宣告了刘、张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传达批示之后的12月27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人员，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了跟着刘、张跑的彭家治搞派性活动，并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的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送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他斥责彭家治与四川石油另一派负责人王存友（同是32111英雄钻井队成员，五好标兵）是“两个败家子”。

由于刘、张的倒台，也由于四川石油会战并未按照最初的设想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反而成了浪费大量国家资金的“败家子”，无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刚刚摄制完成，还没有公开上映就被打入冷宫，封存至今。

□ 原载《红岩春秋》2003年第二期

~~~~~

#### 【史海钩沉】

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中的较量

• 温 相 •

### （1）军委办事组事件。

“杨余傅”事件以后，总参谋长空缺，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开会讨论，林彪提议说：不行就先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夹袋人物当时有这几个：刘震、曹里怀、皮定钧、杨得志，其中，毛比较倾向于皮定钧，但是，皮定钧资历浅，所以，毛泽东就提了前三位，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是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这句话后来导致这两个人被错误的定性为林彪集团分子）”最后，毛泽东就说：“皮定钧行不行？”林彪不说话，周恩来始终不发言，毛泽东就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其实是改让谢富治去办。

黄永胜上任后，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像萧华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按：萧华因为强奸国防科工委女干部，被聂荣臻告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后，被叶剑英保出来，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最后，毛泽东就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林彪先出去的。

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提议杨成武兼任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垮了以后，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办事组组长，毛泽东也不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此后，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办事组。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林彪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他说过：“我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这个插曲没有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件事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视作林彪“篡军”的一大罪证。

客观的说，林彪把黄吴叶李邱统统的塞进办事组，已经是自找苦吃的开端。

### （2）叶群进入政治局事件。

九大在1969年4月开幕，此前，确定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江青听说叶群要进政治局，就找到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总理你是知道的，我47年就和你主席的领导下并肩作战了，叶群呢？她要进，我就退出。”周恩来把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不知为何不是大敌当前）江青就不说话了。

林彪找过毛泽东说：叶群还是退出来好些。毛泽东说：叶群在批判罗瑞卿、杨成武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同志们都提议她。毛始终没有说特别肯定的话，林彪也没有坚持，叶群知道后，在林彪面前大闹一场，林彪再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件事。

吴法宪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就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

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1960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上面就说：叶群进政治局的事，他和邱会作、吴法宪都不同意，林立果也反对，林立果说‘主任（叶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要把首长给毁了’但是，黄永胜赞成，吴法宪当着叶群的面也不敢说，我有一次和林彪说起来，林彪没说话，最后告诉我：以后，这事不要提了。所以，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劝他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古来如此，林彪在这件事上已经被毛泽东、江青视作有了个人野心。

~~~~~

### 【史料存真】

在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9日和12日)

• 江 青 •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太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全心全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在艺术上也应该是站得住的，否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一点说明了，同志们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评论的队伍，当然评好，也评坏。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化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打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进行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得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

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是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查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斗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

北京京剧一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出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阶级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够搞创作。用抓创作的名义来压革命，那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错了的，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